



用凝视铭记一种伟大

□ 华 静

父亲的床头，至今摆放着他50多年前买的那台台式收音机。咖啡色的外壳，正面的城面是勾了金线的黄色菊花。这台收音机里播出的评书、相声以及电影剪辑，还有歌曲等诸多节目，曾陪伴着我们一家人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父亲像爱护珍宝一样爱护着他的收音机。几次搬家，都不舍得丢弃。作为20世纪50年代曾经参加过祖国大三线建设的老人，他经常感慨今天的好日子真的是他原本不敢想见的。

如今，耄耋之年的他很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但也不甘心静享晚年生活，于是，他给自己制定了生活计划。这些计划中，就有帮我收集报纸副刊样报的内容。

因为我们分别在北京和山东两地生活，一年中我们相聚不超过5次。每次相见时，父亲送给我最重的礼物就是报纸。那些捆绑得很齐整的一摞摞报纸，都是他精心挑选出来的。从版式到内容，从栏目到标题，都是那些版式设计独特、栏目吸人眼球的好版面。

见我很惊喜地样子，他很欣慰。有一次，我对他说：老爸，多亏您提供的报纸，我几次做版的灵感都来自于阅读人家的主题表达。父亲一听这话，深信不疑。之后，给我收集报纸的热情更高了。

就在今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们通电话，他问我，1978年，你是不是15岁？我说是。他就在电话里给我念了一段文字：“1978年的中国，是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如果说，1949年中国的变化是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那么，1978年的变化则是中华民族走向富裕道路的开始。这一年，有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因中国的变化而改变，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前进的每一步都将引起全世界目光的关注。”

他说，你做副刊时，要考虑这些主题啊。我一听就乐了。我说您俨然是我的领导啊。于是，顺着他的思路，我当真梳理了改革开放40年以来难忘的故事，发现每一个10年发生的变化其实就是共和国发展历程的一个个缩影，让人难忘，不忘。

1978年，我15岁。这一年，我刚读高中。从杂志上读到了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通过这篇小说里提到的两本书《牛虻》《青春之歌》，我开始阅读更多的文学书籍。那个时候，学校图书馆的借阅登记本上，频频出现我的名字。

这一年，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今天的成功者中，有许多人都



受益于高考制度的恢复。当时，“大学生”一词成为我刻画在铅笔盒上最美的标识。读书，就能成就梦想。这样的理念萦绕在我的心里，从考上大学的学姐学姐们身上，分享着饱含激情的青春年华。当时，父母都是工人，他们每天加班加点，却总是无怨无悔。他们是工厂的主人，在他们眼里，劳动者是光荣的，是美丽的。

这一年开始，家里的亲戚朋友在给孩子压岁钱的同时，都会送一本书表达对孩子的祝福。我的书柜里，《我的大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乘风破浪》等书，就是这样一本本地积攒起来的。我至今感谢生命中这一时期难得的“精神补给”。

1988年，我25岁。毛阿敏的《思念》，张艺谋的《红高粱》，青歌赛上的“西北风”，都成为我们那一代人拥有过的情怀。

当全国人民庆祝改革开放10周年时，那个冬天的午后，我们一家人穿戴好，在运河边上照了一张彩色合影。照片上，父亲和母亲50岁刚出头，父亲着深灰色中山装，母亲着浅灰色西装，衬衣都是白色的。妹妹的五色花毛衣，弟弟的蓝色夹克，我的棕黄色的条纹连衣裙，所有的色彩成全着我们向往美好的心愿。

“中国农历龙年，亚洲人口在1988年达到了30亿。”至今不知这是谁在单位开水房墙上写下的文字。时年1岁多的儿子作为全国3.8亿少年儿童中的一员，第一次庆祝自己的六一儿童节。

1998年江西、湖北的大洪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挥之不去的记忆。一个叫作“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口号，写在了那个夏天。

忘不了，时年5岁的小侄子站在

茶几上，用一个可乐瓶当麦克风，有模有样地吼着刘欢的《好汉歌》。忘不了，在《相约1998》的歌声里，我在团结湖那间拥挤的小屋里跟着王菲和那英开唱：相约那永远的青春年华，心相约心相约，相约一年又一年，无论咫尺天涯。这一年过后，我出版了自己的诗集《有梦在前头》。其中一首诗《永远的感谢》，让我内心充满了灿烂的涟漪，一段奋斗的经历飘荡在动人的传说里。

2008年，在南戴河党校培训班的课堂上，我们惊闻汶川地震的消息，牵挂和凝重，缓缓上升为一种责任。经过汶川地震的洗礼，“一切想着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言行礼赞着灵魂的光彩，我们发现，整个世界都在谛听中国。

紧张忙碌中，我们也在关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之前，有专家说，北京奥运会是打开中国巨大商业市场的一把钥匙，将给世界各国的企业带来无限商机，将促进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之后，有报道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多元化的中国，从而对中国刮目相看，北京奥运会是一次中国国家形象的成功展示，是中国成为国际大国，开始发挥国际影响力的转折点。

2018年，新的历史坐标。

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

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这是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中的一句话。发展、创新、追求美好生活，一幅蓝图，已经铺开，且深入人心。

来往于海南的人们越来越多，甚至过年过节时这个原本辽阔的大岛也出现了车辆拥堵的情况。在海南买房子的人也都逐渐地把海南当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后悔当年没有在海南买房了吧？”2004年五一假期，我们一家三口带父母去海南度假，那是父母第一次踏上海南岛。为了出行方便，我们雇了一周的出租车，每天早上来宾馆接我们，然后按照我们的计划，沿着海岸线到处走。开车的师傅大约有30岁左右，东北小伙子，很健谈，嘴也甜，每天都把我父母哄得很开心。他还建议父亲在海南买房子，他说他负责给看管房子。当时海南的房价3000多，我们都没有上心，因为觉得太不现实。听我们这么说时，父亲只是笑笑。用他的话说，这个时代发展太快了，变化也太大了。

“没有想到啊”。40年的变化，像一幅连画，让所有翻看画页的人放不下。

纪念改革开放40年，用凝视铭记一种伟大。我想用我的诗句表达：“总有那么一个时刻。总有，不要说已经遗忘；总有，不要随意地错过；想想，总有那么一个时刻……”



那天，“第八届海峡两岸儿童肿瘤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至此，两岸三地儿童肿瘤学术研讨会在张金哲院士等老一辈儿童肿瘤专家的发起、推动下，已走过了14年的历程。在这个学术舞台上，我们看到了海峡两岸的专家们在儿童肿瘤诊治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取得的成就，更看到了血浓于水的感情在儿童肿瘤诊治这个学术平台上的流动。

当98岁高龄的我国儿童肿瘤奠基人张金哲院士颤颤巍巍走上讲台的时候，全场响起长久的、雷鸣般的掌声。他要我们在今后的诊疗活动中，尽可能地为患者妈妈的陪护提供便捷。他要我们重视与患儿妈妈的沟通，让妈妈参与到诊疗活动中来。为了在繁忙的工作中还能做到向每一位患儿妈妈交代清楚病情和注意事项，他要我们培养三分钟口才，用三分钟讲清楚该讲的。他要我们将对每个病种的注意事项写成小卡片，便于讲解时不啰嗦，也不遗漏。他不让我们追求患儿的带瘤生存状态，他说：“那样，患儿会遭受更多的痛苦，也会拖垮家庭、拖垮社会。”他让我们努力做到“儿不痛，母不悲……”

在短短20多分钟的演讲中，老人家反复用到一个词“拜托”，而且还数次深深地向下台鞠躬。他已力不从心，在儿童肿瘤诊治方面的诸多想法只能交付给我们这些后来人去完成，不禁让我们这些后来人动容，我们感到了一种使命交接的悲壮与神圣。

记得26年前，我刚开始从事儿童肿瘤诊治工作的时候，读了陆道培院士主编的一本书《白血病治疗学》。陆院士在序中写到，“回想我在34年前刚开始从事血液病学的时候，急性白血病的治疗除了输血和护理之外，治疗方法少得可怜，绝大多数急性白血病患者在半年内死亡。因此，家父——一个眼科大夫，极力阻止我从事白血病研究。按照他的说法，治疗白血病的医师只能起到为患者通向‘阎王爷’的道路开通行证的作用。

那篇序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肿瘤这个学科，是一个多么充满悲情色彩的学科啊！它就像一个战场，一代一代肿瘤工作者，前赴后继，迎难而上。他们似乎都有一种大无畏的气概，都有一种使命担当。

我就是在陆院士这篇序的感染下，怀着一种近乎悲壮的情怀走上了儿童肿瘤工作的岗位。我发现，相较于成人肿瘤，我国儿童恶性实体瘤的诊治水平更加落后，发展更加缓慢。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处于“发病无统计，治疗无规范，死活无随诊，评价无标准”的落后状态。由于当时国门的封闭，老一辈儿童肿瘤工作者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早期的儿童肿瘤治疗，基本上只有手术切除一种方法，直至改革开放，国门打开，欧美发达国家的治疗理念迅速引进后，我国儿童肿瘤治疗的落后局面才得以迅速改善。

在日复一日与死神抢夺孩子的工作中，我发现，我们面对的不只是一个个患有肿瘤的孩子，而是一个个家庭，甚至是一个家族。我无数次目睹了患儿家长得知唯一的孩子被确诊为恶性肿瘤后所表现出的那种极度的痛苦和绝望。我也无数次目睹了一个个家庭因为给孩子治病而倾家荡产。

曾经读到过一篇文章《那一种幸福戛然而止》，记述了一个母亲从孩子确诊视网膜母细胞瘤到最后离世的整个心路历程。那篇文章，让我更加真切地理解了作为父母，在孩子身患绝症时的那种痛苦与无奈，也让我更加真切地意识到，在攻克儿童肿瘤的道路上，我们面对的不仅是孩子身上肆意生长的肿瘤，还有一颗颗幼小无助的心、一个个挣扎在痛苦泥沼中的家庭，无数的需要迅速破解的难题……

儿童肿瘤诊治经过改革开放后这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应当说，已取得了巨大进步。近年来，国家推行的儿童大病



拥抱这充满悲情色彩的学科

□ 刘秋玲

救助、医疗保险、农村合作医疗等政策，中国红十字会成立的小儿白血病专项救助基金“天使基金”、一些省市实行的儿童白血病免费救治等措施，都为肿瘤患儿的诊治提供了经济上的有力支持，使更多的患儿能够得到救治。

随着儿童肿瘤疗效的不断提高，儿童肿瘤治疗的目标已从过去单一的追求生存转变为生存与功能维持、心理健康并重。在这一过程中，多学科联合、社会力量的参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一些爱心妈妈自发募捐资金，为患儿联系住院，在化疗期间为患儿提供食宿。一些地方也成立了“生命小战士会”，许多义工为肿瘤患儿及其家庭提供了生活尤其心理上的援助。

尽管如此，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我国肿瘤患儿的早期诊断率仍很低，70%的患儿就诊时已进入中晚期。在一些边远地区，儿童肿瘤的诊治水平还十分有限，甚至存在很多误区。因此，张金哲院士呼吁，妈妈在给患儿的每日洗澡中要养成全身摸一摸的习惯，以发现早期肿瘤。儿童肿瘤虽是一种小众性疾病，但随着营养性疾病及感染性疾病的有效控制，它已上升为继儿童意外伤害之后威胁我国儿童生命的主要疾病。令人鼓舞的是，努力防治儿童肿瘤，已被写进“十三五”规划中，政府已在儿童肿瘤防治方面进行不断投入，并在科研立项等政策上给予倾斜。

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儿童肿瘤工作者的春天已经来临。让我们以极大的热情，去拥抱这个充满悲情色彩的学科吧！



人贵有良知

□ 陈鲁民

良知，又叫天良、良心，是人与生俱来的内心“是非律”，是天赋人类生命中不学而知、不学而能、先天具有的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也是一切道德伦理的基石。《孟子·尽心上》说：“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谢灵运《游南亭》也说：“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

良知有四项最主要内容：明善恶，知羞耻，有恻隐心，知恩图报。明善恶就是知道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心里有正确的是非标准，能分清好坏美丑，知晓什么事可以做，且多多益善，什么事打死都不能干；知羞耻就是有羞耻之心，平时严以律己，循规蹈矩，一旦做了有违道德的事时就于心不安，无地自容，引以为耻，愧疚不已；有恻隐心就是对别人的不幸表示同情，见到遭受灾祸或不幸的人会产生同情之心，并主动施以援手，慷慨解囊，雪中送炭；知恩图报就是人要常怀感恩之心，对一切帮助过自己的人心存感激，念念不忘，“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人敬我一尺，我还人一丈”。若做到了这四点，就叫天良未泯，一般情況下，不露声色，甚至“其貌不扬”，但却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堵住不该下泄的水流，防止灾难发生，确保下游万物不受侵害。

“人之初，性本善”，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特殊环境的负面影响，人的良知确实可以与生俱来，是一种天赋的道德，诚如孟子所言：“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知也；所不虑而

耻的小人、恶人、坏人。

如果形象地比喻，良知就如同一轮明月，虽不如太阳那样光芒万丈，普照大地，事关万物生长，但皓月当空，清辉皎洁，会照亮夜行之路，让我们的人生路上“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再复杂环境下也不至于迷失方向。

良知如涓涓溪流，虽不如大江大河奔腾呼啸，激荡污浊洪水，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但清溪流水能洗涤我们的心灵，不使其藏污纳垢，滋润我们的心田，不使其荒芜龟裂。正所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良知如汽车刹车，虽不如发动机那样雷霆万钧，带来风驰电掣的速度，却能让我们及时在险境前止步，在歧途上回头，以保得身心安全，在正确的道路上疾驶。

良知如水库闸门，虽然平时默默无闻，不露声色，甚至“其貌不扬”，但却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堵住不该下泄的水流，防止灾难发生，确保下游万物不受侵害。

“人之初，性本善”，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特殊环境的负面影响，人的良知确实可以与生俱来，是一种天赋的道德，诚如孟子所言：“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知也；所不虑而

知者，其良知也。”王阳明也说：“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良知。”

但是要使良知稳定而持久，坚韧并可靠，源源不断地发挥作用，则要靠后天长期不懈地自觉磨练，维护保养。否则，良知也会如身体里的钙那样，悄悄流失。而当良知不复存在或所剩无几，一个人就如同失去了免疫力，会百病侵身，一路堕落，失去判断善恶的标准，做坏事就没有顾忌，就不会脸红，什么恩将仇报，忘恩负义，伤天害理的事都能做出来，成了十恶不赦的魔鬼，等待他的就只能是法律的严惩。

人生在世，觉悟、修养、道德都很重要，但这些都是建立在良知基础上的，要靠后天的启蒙、教育、自觉养成，如果没有稳定可靠的良知基础，那些觉悟、修养、道德之类是很难立足的，即便满嘴冠冕堂皇的理论、信条，也多是自欺欺人的表演。反之，一个人即使没有接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不会子日那一套，只要有良知打底，知羞耻，明是非，就不会干出太出格的事，就能堂堂正正，规规矩矩，“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地”。

